

# 周素园参加红军长征前后思想的演变

顾 隆 刚

一九三六年，周素园从毕节家乡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随军长征到达陕北。这位年近花甲、望穿乡里的老知识分子，在红军战略转移十分艰辛的时刻，毅然投身革命，其精神难能可贵；其事迹在我党历史上也是突出的。

周素园辞世已二十八年，现在回顾他坎坷的历程，参加红军的经过，特别是其间所表现的崇高理想，对革命的热情追求，既是对这位革命老人的缅怀，也能从中获得许多教益。

## 一、坎坷的历程

周素园又名周培艺，（1879—1958）贵州毕节人。“前清的贡生，没有进过任何学堂”。①初发蒙于其父，继受业于秀才刘恒山，后师事举人罗发山。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留心政治，“为求救国良策”，他研读过《筹富国策》、《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海国图志》、《万国史记》、《时务报》、《湘学报》等新书刊，并曾徒步东渡日本留学。一九〇四年他向贵州当局呈《派遣留学生出洋条陈》，从而促使贵州打开派人出洋留学的局面。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恶浪，为疏通民智，他在贵阳创办了贵州第一种报纸——“黔报”。接受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思想，并在“辛亥革命前加入了同盟会”②后，曾协助张百麟等创办贵州“自治学社”，参加并领导了贵州辛亥革命。贵州光复，他担任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做

了不少实际工作。刘显世勾结滇军入黔，自治学社成员惨遭残杀。周素园抱病潜离贵州。在他取道重庆、武汉，到北京的一路上，仍为贵州辛亥革命遇难者呼吁控诉。但时局每况愈下，周素园当时的心情，如他一九五四年“述怀诗”所记：“忆昔风云会，屠龙意气豪。坦怀招寇盗，挥泪哭朋僚。伟业空中幻，余生死里逃。不谈刘与项，颇识桀和尧。愁甚饥寒逼，拼得笔砚烧。”③

以后十月革命发生，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诞生，都对当时流落北京的周素园产生影响，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目睹军阀混战、蒋介石的独裁的严酷现实，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鞭策下，他终于选择并走上了探求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蛰居毕节老家的周素园，潜心攻读马列主义著作，寻求革命真谛。其间，蒋介石等多次诱他出山，周素园不为所动。当时周素园精读过的《资本论》上，至今留着密密的圈点和眉批，可见其钻研之深与用功之力。从此，他向往无产阶级革命之情常溢于言表。

探索贵州辛亥革命的流产、旧军阀的混战、新军阀的独裁、民众的苦难的历史和现实及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是他攻读马列主义的动力。同时，随着红军运动的勃兴，尤其红军前后四次在贵州进行革命活动，例如：一九三〇年，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在黔桂边的斗争；一九三四年五月，贺龙等同

志率领的红三军，在黔东北创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达半年之久；同年十月，王震、肖克等同志的红六军团西征转战贵州；特别是长征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在贵州战斗达四个月之久，红军的宗旨、共产党的主张、方针和政策广泛传播和毕节地区出现的地下党组织和革命青年的活动，都促使研究马列主义、向往革命的周素园的思想进一步转变。

## 二、周素园与抗日救国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一九三六年二月初，转战来到毕节。

之前，贵州地下党组织已在毕节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并以组织武装力量为首要任务。一九三五年八月，邓止戈等第二次到毕节，准备在川、滇、黔边进一步开展武装工作。一方面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组织，派专人与“红军游击队”联络；另一方面秘密联系反蒋情绪强烈的地方绿林武装，取得一定成效。<sup>④</sup>

当红二、六军团到达镇西卫时，地方党组织派邓止戈、徐健生等，向红军汇报了地下党和武装力量的情况，为红军顺利进入毕节提供了方便条件。

红军占领毕节以后，迅速开展了各种组织工作，将在大定县成立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来毕节。又在各地成立游击队的基础上，着手组建抗日救国军。

获悉周素园的有关情况之后，贺龙、王震、夏曦（当时肖克在东战场）相继登门拜访，经过交谈进而了解了周素园对我党的主张、红军的宗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解，远非一般知识份子可比。经贺龙等同志商议，决定敬请周素园出任抗日救国军司令。周慨然答应。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就设在周素园家里。党派邓止戈任抗日救国军参谋长，下辖三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席大

明、第二支队司令员周质夫、第三支队司令员阮臣俊。共约千余人。

红军在毕节期间，王震又传达了军团部创立川滇黔新苏区的意见，并提出由抗日救国军司令部组织地方武装担任后勤任务；作战任务则由主力承担。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派席大明去收拢一部份与他有联系的地方武装，统一由他指挥；派阮臣俊去叙永一带，迎接川南游击队余泽鸿余部，来毕节会师；留周质夫部驻毕节。

抗日救国军成立后，在周素园的努力下，许多反蒋抗日有识之士纷纷团结到抗日救国军旗帜之下：成百上千的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二十多天，参加红军的总人数不下五千人。当时组成了两个独立团：一个是十四团，团长肖美成，属红二军团五师领导；另一个是三十二团，由抗日救国军为主组编而成，属六军团十八师领导。第二支队周质夫部，经过杨家湾整编，部份人员编遣回籍，干部从红军中抽调充任，并划归三十二团建制。

## 三、周素园在滇黔路上

当敌郝梦龄纵队占领纳雍，李觉纵队由织金，郭汝栋纵队由大定，同向水城、威宁之线截击，企图和先机驻守在昭通、威宁之线的滇军孙渡纵队与遥相呼应的川军连接，从四面合围红军时，红军军团部决定乘敌未合围之先进行转移。二月二十七日，红军沿毕威大道逶迤西进。周素园辞别亲友，随大军踏上征途。此时，邓止戈调六军团部任作战参谋；周素园则随军团部进止。

在敌万耀煌的先头部队进占毕节后，遂采取虚实结合，声东击西的战术，红军为脱敌人的跟踪，开始了红军战史上有名的乌蒙山千里回旋战役。

乌蒙山区重峦叠嶂，又是料峭春寒之时，山高、苔滑、居民鲜少，这是二、六军

团长征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在强敌紧追不舍，红军频频转移的情况下，军团领导考虑周素园高龄的困难，拟动员他暂时离队。据邓止戈回忆：“贺龙同志请王震同志去商谈周素园同志是否参加长征的事情。王震同志给我讲：周素园同志那么大年纪，身体又不好，行军有困难。其意叫我去跟周素园同志讲，请他到昆明或者香港去当富翁，给党做统战工作。如果他愿意去，我们打土豪得的黄金、银元，可以到香港修点房子住下来。我跟周素园同志讲了后，他考虑了一下：我今年六十岁了，六十岁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我参加了红军，正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我不愿意离开红军。我将这个情况告诉了王震同志，王震同志又转告了贺龙同志，贺龙高兴地说：

‘好！把他抬起走！’”<sup>⑤</sup>

当红军转战在镇雄西南大山中的时候，除敌樊松甫纵队跟追红军外；郝梦龄、万耀煌纵队转进到镇雄截击；李觉、郭汝栋纵队从威宁北上，加入围堵行列。当红军乘隙跳出敌军重围转而南下之际，滇军在昭通、威宁之线，以重兵构成纵深防御，列阵以待。

滇军七个旅、二万四千多人，武器精良，多从比利时、法国进口，人员亦训练有素，纵队司令孙渡调度适宜。因此滇军横出，对长征中的二、六军团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但龙云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蒋介石遣军入西南，即有假途灭虢之意。而滇军屯兵滇东，也含有防犯蒋军的考虑。

为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肖克军团长和周素园分别去信给龙云、孙渡等人，揭露蒋介石叵测的居心，并晓以民族抗日大义。周素园即积极接受了这方面的任务。在他给孙渡的信这样写道：

“孙司令官：我们虽没有见过面，但我常听许多朋友说，你是贵省军官中头脑最清

晰、最了解新思潮的一个。你曾和唐继虞到过贵阳，谅也知道周素园，所以我很愿意和你谈谈。目前中国已到千钧一发最危急的时期，国家的独立仅存口号；民族解放将赴东流。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尚尔艰苦斗争，欲挽此垂危之命。

阁下！我想纵然是不接受共产主义的人，对于他们的这种精神，也不能不十分钦佩吧。他们的策略非常进步，路线非常正确。鉴于目前形势，最近决议扩大民族革命战线，联合一切反日反蒋的力量，来组织抗日救国的政府和抗日救国联军。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必要新局面的展开。因为爱国心谁不如我，沉机观变大有其人，只要不甘做亡国奴和卖国的走狗，当然要求一条新出路。尤其是我们云贵佬，富于倔强性和自信心。别人用势力压他不肯屈服；别人看他不关轻重，他却能埋头干某些工作，护国成功就是先例。我听说阁下平时对于虚荣与享乐都不大注意，然则具有丰富的知识、怀悲悯之志量，将泯泯以殁世乎？必不然矣。我不是学政客策士来游说你，更用不着拿升官发财来鼓励你。我是劝你以宝贵的血花造光荣的历史。我和你讨论的问题，也另函达龙主席。你能自动自决，固我所盼望。即不然也请你迅电龙主席，促其早定大计。积极则回戈杀贼；消极则保存实力。我们将以你的实际行动，来测定你的回答。此致

革命的敬礼

周素园谨启”

这封出自一位党外人士的手笔的信，反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而且从信中对时局的分析，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特别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深入理解和热情宣传，是他参加红军后政治思想水平的猛进。周素园在滇黔路上的所言所行，表明了他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忠诚。说明他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亦已确立。

周素园的信产生了一定影响。滇军纵队司令员孙渡接信后，一面提兵南下静观态势；一面“火速呈送龙云”。

红军在虎头山与滇军接战后，三月二十八日，挥兵直取盘县；而孙渡率滇军西向曲靖、龙马方向前进。当红军向云南嵩明进军时，卢汉奉龙云之命，令孙渡在普渡河夹击红军时，孙渡却对卢汉说：“普渡一条小河，不会成为红军通过的障碍，即使不能通过，也只能促使共军多兜几个圈子，拖我们的部队多跑些路而已，不会收什么歼灭之效，但我尽力去做就是”<sup>⑥</sup>。事后孙渡也没有去普渡河夹击红军。而此类“消极则保存实力”的行动，孙渡在滇东与红军的对抗中一再有所表现。

#### 四、奉命南归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周素园随红军到达保安，到陕北以后，他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他又为革命作了许多新贡献。

“西安事变”后，周素园被委任为八路军高参。为深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素园奉命南归，并“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访问国民党西南当局，要求释放政治犯，并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扩大政治影响”<sup>⑦</sup>。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他风尘仆仆地赶到重庆，虽然受到了冷遇，但仍以党的

事业为己任。接着，他又到成都，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九三八年一月，龙云两次电请周素园赴昆明。周素园到昆明后，在青年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络绎不绝地来访问周素园的各界青年朋友，每日不下二十人。周素园还将西安邮寄来的各种理论书刊，散发给进步青年。朱家壁等青年就是在周素园的鼓励和介绍下奔赴延安的。周素园还在昆明筹集“白药”两万盒航空邮寄西安，转前方抗日将士。

周素园在昆明八十天出色的工作，自然招致当局的猜忌，以至将其“礼送”出境。回到贵州后，又被强令“回原籍养病”。直到全国解放，他才获得自由。

周素园同志的这一段经历，正如他奉命南归时，毛主席给他的信中所评述的那样：“你是一个奋斗的人”、“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同志”。

#### 注释：

①②⑦《周素园自传》见《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辑》第474页

③周素园《光明日记》见1958年2月7日《贵州日报》

④⑤邓止戈《两进毕节的战斗历程》见《毕节党史资料》第一期。

⑥孙渡《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期。